

# 池田大作儿童文学中的多元对话及价值

华中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 李俄宪, 吴江舒悦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 池田大作创作了 23 部儿童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已被翻译成 19 种语言, 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版, 其适读年龄跨越了幼儿、少儿、少年多个儿童成长阶段。从读者接受的情况看, 池田大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受到了儿童的欢迎, 也打动了不少家长读者, 究其原因, 作品中突出的对话意识不可忽视。池田大作的儿童文学以对话为隐性视角, 达到了解构传统叙事者的效能, 使叙事者与读者处于主体间性的关系之中, 以联系、交流的双向互动关系取代了单一、孤立的主客体关系, 更紧密地勾连了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 因此能发挥深刻的教育作用, 蕴含着丰富的教诲价值。事实上, 对话不仅是池田大作儿童文学的书写策略, 更是内容本身。池田大作的儿童文学中, 对话的对象具有多元性, 包括了自我主体间的对话、与异文化对话、与自然对话、与历史对话的四个主要的向度, 体现了池田大作对儿童主体性成长的关切, 见证了其培养儿童与人和善、与环境共生精神、尊重历史真相的教育目标。

## 一、池田大作的对话观与“青春对话”

“对话”(德文 Dialog, 源于希腊语 dialogos), 由巴赫金(Bakhtin Michael)作为文学理论提出, 他认为“一切都是手段, 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 什么也结束不了, 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 生存的最低条件。”<sup>[1]</sup>。在文化史的长流中, 早在古希腊时期文学与对话便相互干涉, 以至形成了特定的文学形式——对话录。对话中机智的问答, 多元的思维和求同存异的精神被现代社会深刻认同与需要。

池田大作毕生致力于以对话的方式推进人类幸福、和谐的道路, 他认为“所谓对话、讨论, 本来是在两种以上的见解发生对立时, 根据冷静的理性和知性, 通过耐心的商谈, 获得更好的扬弃, 在这里谋求解决的办法。”<sup>[2]</sup>他提出对话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信任对方、相互理解的心态”以及打破各自的立场“站在全局观的立场上”寻求“更高层次的解决之道”, 其要义是敞开心扉, 因为“‘对话’是‘把灵魂向对方敞开, 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视’的行为”<sup>[3]</sup>, “封闭的内心无法从根本上展开对话”<sup>[4]</sup>, 与此同时, “鲜活的批判力”<sup>[5]</sup>是对话中不可或缺

<sup>[1]</sup>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第 340 页。

<sup>[2]</sup> 池田大作、松下幸之助:《人生问答》, 卞立强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年 9 月, 第 162 页。

<sup>[3]</sup> 池田大作:《我的人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 155 页。

<sup>[4]</sup> N·I Search & Study: 第 18 回「SGI の日」記念提言 1993. 1. 26, 「平和提言」「記念講演」(池田大作全集第 2 卷), しおり 13。

注: 本文所有标注“N·I Search & Study: ”的脚注, 表示引文来自“Nichiren·IkedaSearch & Study”研究网站, 网站地址: <https://gmate.org/gs/lib/gso10.cgi?ori=&K=>。其中“しおり”为网站管理方所做的该书该章节书签编号。例如本条指“引用自 N·I Search&Study: 章节(名或有时间), 书名(或有合作者名), 标签 13”, 以下不做重复说明。

<sup>[5]</sup> N·I Search & Study: 第 20 回「SGI の日」記念提言 1995. 1. 24, 「平和提言」「記念講演」(池田大作全集第 2 卷), しおり 22。

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话“探究真理”<sup>[1]</sup>“实现和谐”<sup>[2]</sup>的最终目的。

池田强调对话的重要性，甚至提出“放弃对话是人类的失败”<sup>[3]</sup>，“对话和共存是人类历史的要求”<sup>[4]</sup>。他积极投入对话实践，与各国各界人士共同创作了对话集共 36 部，时间跨越了大半世纪，对话的内容包含哲学、历史、文化、世界格局、宗教、文学、教育、人生经历等诸多领域。正如池田大作在演讲中所说：

我想，无论是与邻居的对话，还是与历史的对话，抑或是与自然和宇宙的对话，只有在对话的开放空间中，人类的整个人性才能得到保障，自闭的空间只能成为人类精神自杀的场所。因为人不是一出生就是人，只有在以文化传统为背景的“语言的海洋”和“对话的海洋”中不断锻炼，才能了解自己和他人，成为真正的人。<sup>[5]</sup>

在池田看来，人类唯有依赖自然、历史、文化等丰富的对话资源，才能突破自闭的精神空间。因此他践行对话活动发同时，注重以“世界市民对话”、“青春对话”等形式传递对话精神，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折射了池田对其对话理论来源的孔子、耶稣、佛陀以及苏格拉底<sup>[6]</sup>等宗教、先哲传道受业方式的现实延续。

池田如何与儿童对话，以提高儿童的对话意识与对话内容的丰富性是本研究聚焦的核心。池田极为重视儿童文学的作用，他认为儿童能够通过父母声情并茂所展现的文学世界<sup>[7]</sup>对话文化、历史、自然的广阔世界，在父母的爱意中建立起链接世界的信任与好感，提出“家人的这种对话，自然地成为对孩子们的教育”<sup>[8]</sup>。池田重视儿童文学的要因在于其作为承载对话的媒介具有丰富性和适配性，他认为“文学教会我们‘作为人’的成长和‘作为人’的富足。”<sup>[9]</sup>，而“所谓‘童话世界’就是不用艰深的大道理，而是用‘完整的形象’来教导我们有关人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意义及对事物的善恶的分辨。”<sup>[10]</sup>池田大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对话树立了“完整的形象”，以“对话连接人与人，心与心的力量”<sup>[11]</sup>激起儿童丰沛的情动，从而以情感的纽带“把人们链接成一个伟大的超越民族的整体。”<sup>[12]</sup>

<sup>[1]</sup> N·I Search & Study: 第 18 回「SGI の日」記念提言 1993. 1. 26, 「平和提言」「記念講演」(池田大作全集第 2 卷), しおり 13。

<sup>[2]</sup> 池田大作、松下幸之助: 《人生问答》，卞立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 162 页。

<sup>[3]</sup> N·I Search & Study: 对话的重要性について，「大いなる魂の詩」チングス・アイトマートフ(池田大作全集第 15 卷)，しおり 1。

<sup>[4]</sup> N·I Search & Study: 全面軍縮へ世界的潮流を 1988. 6. 1, 「平和提言」「記念講演」(池田大作全集第 2 卷)，しおり 2。

<sup>[5]</sup> N·I Search & Study: 新しき統合原理を求めて 1993. 1. 29, 「平和提言」「記念講演」(池田大作全集第 2 卷)，しおり 12。

<sup>[6]</sup> N·I Search & Study: I 仏典の結集，「私の釈尊観」「私の仏教観」「続・私の仏教観」(池田大作全集第 12 卷)，しおり 3。

<sup>[7]</sup> N·I Search & Study: 脱テレビ文化，「私はこう思う」「私の人生観」「私の提言」(池田大作全集第 18 卷)，しおり 3。

<sup>[8]</sup> N·I Search & Study: 「開かれた家庭」への一步は対話から，「婦人抄」「創造家族」「生活の花束」(池田大作全集第 20 卷)，しおり 3。

<sup>[9]</sup> 池田大作: 《青春对话：与二十一世纪主人翁倾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年，第 266 页

<sup>[10]</sup> 池田大作、里哈诺夫: 《孩子的世界》，卞立强、李力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年，第 2 页。

<sup>[11]</sup> N·I Search & Study: 埼玉青年部文化大総会、二十五周年記念青年大会 1999. 9. 12, メッセージ集(池田大作全集第 67 卷)，しおり 2。

<sup>[12]</sup> 池田大作、里哈诺夫: 《孩子的世界》，卞立强、李力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年，第 9 页。

池田儿童文学的丰富性指向了多元对话的品格。下文分四章分析，首先以成长小说《两个王子》《月亮与公主》《彩虹山》为对象，探究池田大作儿童文学中的镜像人物塑造和集体人物书写的表征，认为其对儿童自我对话，自我塑形路径的复写蕴含着勇敢、坚强、智慧、舍己为人等美德教训；其次讨论少年小说《太平洋的虹桥》、冒险小说《喜马拉雅山的光之国》，指明跨文化对话中儿童重塑文化秩序的主导位置，梳理东西文明对话中儿童从流散主体到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变化，剖析池田大作世界公民教育的创作意图；再次以池田大作生态儿童文学、动物小说、拟人童话《雪国王子》《王子与珊瑚海》《沙漠王国的公主》为例，通过与动物、环境、生态圈的对话，展现池田大作敬畏自然、关爱动物他者的文学教育理念；最后分析《蓝海与少年》《少年与樱花树》《沙漠中的宝城》中跨时空对话的书写特质，揭示池田大作正视历史真相、反思战争、珍惜历史文化遗产的本心及其教诲价值。

## 二、成长：与自我的对话

在池田大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成长小说是一个重要的类型。莫迪凯·马科斯在《什么是成长小说？》一文中指出，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情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马科斯还根据主人公事件后的心理和行为变化程度，把成长小说划分为三类，<sup>[1]</sup>池田大作的成长小说往往反映了第三种类型的路径，即在成长的冒险中儿童获得了世界观和性格的改变，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其中，《两个王子》《月亮与公主》《彩虹山》三部小说，对应了少男、少女、少儿三个年龄、性别的适读对象，在小说中，儿童们通过与自我的对话，特别是与镜像自我或群体中的自我的对话，实现了自我的塑造与成长。

### 1. 《月亮与公主》中的镜像自我对话

《月亮与公主》讲述了幸子的成长故事。小说中，幸子的自我成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羸弱的、放任的自我，第二个阶段是坚强、充满信念的自我，第三个阶段是外向、改变他人的自我，对话在阶段转变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月亮王国之旅促进了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成长，月亮上的幸子热情、温和，使地球上的幸子实在地感受并相信了自我美好面向的存在，回到地球后，幸子通过写信与月亮幸子对话的方式保持与美好自我的链接。作品中主人公一分为二的对话，打破了儿童自我的混沌和纠葛。两个侧面的对话本质上是自我的书写与确认，帮助儿童更直观的实现了自我信任与成长。在自我丰盈之后，进入第三阶段的幸子将转变的信心传达给和子，足见自我对话进一步外化成为幸子处理人际关系、帮助他人的方式。从儿童读者的视角看，虽然和子没有像幸子那样亲眼见到另一个自己，但是以幸子为媒介，对话发挥了强大的转变力，能够激发文本外的儿童读者通过联想，照见、对话自我纯粹美好的形象，并以此获得自我成长的契机。

此外，作品中童话世界与真实世界对话的叙事策略，使得儿童在主体构建中多了一重温暖的力量。作品中，月亮王国的构建充满是童话、梦幻的色彩，满足了儿童的童真幻想，而幸子的日常生活的叙事写实客观，描绘了校园生活的诸多细节。两个世界相互穿插，让儿童借助与幻想宇宙的亲近感，重新面对现实生活

<sup>[1]</sup> 吴岩：《科幻文学轮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24页。

中的困难。池田在《孩子的世界》中批评现代文明中“感受性”的缺失，指出“把自然、宇宙，有时甚至把人也变成了客体，使其堕落成为可以用科学、合理主义的解剖刀乱割的疏远对象”<sup>[1]</sup>。《月亮与公主》与之相对，将自然、宇宙描绘成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儿童的主体与宇宙生命的主体相互对话，愈合了现代文明割裂、破碎的弊病。诚如池田所说，“文学是关系人的研究，是研究自我，研究无限的内心世界”，《月亮与公主》所呈现的儿童美好的心灵成长，体现了池田儿童文学人本位、儿童本位的本质。

## 2. 《两个王子》中的镜像人物共同成长

与《月亮与公主》不同，《两个王子》中的镜像人物并非自我的两个阶段，而是共同服务于同一主题的不同人物。作品中的斯巴鲁那和卢比亚，具有拉康“镜像阶段论”所呈现的特质，即“理想我”对“真实我”的矫形与启发。

《两个王子》通过斯巴鲁那和卢比亚两位王子追求“王者的光芒”的成长历程，表达了向善、大爱的主题。在斯巴鲁那的多年影响下，王子卢比亚逐渐改变了残酷的性格逐渐关爱百姓，但是面对巨龙对国家的威胁，他还是无法做出舍生对抗的选择，斯巴鲁那则自愿背上了屠龙之剑一去不复回。卢比亚在巨龙的沼泽边甚至无法寻到斯巴鲁那的遗骸，他对着平静的水面大声呼喊，“斯巴鲁那……，你常常告诉我，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只有为人们祈求幸福与和平，为人们尽力工作的‘人的王者’才是真正的王者。……你就是至高无上的‘人的王者’。这两顶王冠都是属于你的”<sup>[2]</sup>于是把象征王权的王冠和“人的王者”之冠投入水中，此时卢比亚和斯巴鲁那以湖为镜，相互投射，暗喻了两人灵魂的对话与升华。正如肖恩·荷马(Sean Homer)指出：“这面镜子并不单单指现实中的镜子，还指任何有反射的表面”<sup>[3]</sup>，小说结尾处两人对影的湖面便是明示。在两个王子的成长故事中，卢比亚是基人物(base character)，而斯巴鲁那是镜像人物(mirror character)，通过与镜中人斯巴鲁那对话，卢比亚获得了“内省和启发”<sup>[4]</sup>，获得了超越自我的新生。镜像人物与基人物的相似性便于被儿童认知和共情，他们不在居高临下的说教地位，儿童读者能够与他们建立起信任的联系，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成为自主成长的推动力。

## 3. 《彩虹山》中的集体人物塑形

面向幼儿的《彩虹山》借助集体人物塑造的方式鲜明的为儿童展现了美德的力量。在故事中，集体人物的对话不是从一面趋向另一面，而是通过“多声部”<sup>[5]</sup>互补的方式呈现。

池田大作首先将三个儿童主人公“统称”为“三人组”(三人ぐみ)，直到进入彩虹山的幻想世界，三个儿童才被各自介绍，运用了儿童文学中“集体人物”的塑形方式。尼古拉耶娃在《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中说明了集体人物概念，认为集体人物是儿童文学异于主流小说所特有的人物形象，即“所有在叙述中具

<sup>[1]</sup> 池田大作、里哈诺夫：《孩子的世界》，卞立强、李力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sup>[2]</sup> 池田大作：『二人の王子さま』，駿河台出版社，2006年，94-95頁。

<sup>[3]</sup> Sean Homer, Jacques Lac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4.

<sup>[4]</sup> 转引自刘岩：《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14页。

<sup>[5]</sup> 汪安民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第87页。

有同样角色地位或起到相同作用的人物”<sup>[1]</sup>，例如内比斯特的《五个孩子与一个怪物》、特拉弗斯的《玛莉·波萍丝》中都以集体形象为主人公。与上述作品相同，《彩虹山》中的“三人组”也是一个整体的“行动元”，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面对相同的成长挑战。

在作品中，三个儿童在面对困难时能够相互沟通，激励彼此发挥所长。池田运用集体人物形象的主要效能其一是把关于“勇敢”、“智慧”、“力量”的抽象概念具象化为角色，并将人物品质体现在“小勇”“小慧”“小强”的角色命名上，利于儿童读者形成深刻的印象。其二，相较于个体人物，集体人物中的个体各有分工，独具特色且对话互补，有益于达到“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读者提供了合适的主体地位”<sup>[2]</sup>的目的，体现了池田大作儿童文学创作别具匠心的书写技巧。

在池田大作的成长小说中，主人公通过与镜像自我的对话，与镜像人物的对话以及集体人物的“复调”对话，主体性得到“人格的健康向上”<sup>[3]</sup>的成长。池田多次谈到现代教育对人格培养的缺失，因此他的儿童文学充满坚强、开朗、乐观、奉献、勇敢、智慧的美德教诲，与此同时激励儿童将对话的方式传递给他人，促成“人类的童年”<sup>[4]</sup>的共同成长。

### 三、理解：与异文化的对话

儿童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往往因文化的碰撞感到迷茫，这于现代化社会尤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网络社群的多样化，作为互联网社会“原住民”的儿童不由自主、不可逃避地面对着异文化带来的冲击。因此对于现代儿童而言，理解异文化，掌握与异文化对话的方式尤为重要。池田曾多次在演讲、对谈中提到联合国将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设立为“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sup>[5]</sup>的决议，并且从儿童的角度提出建议，他认为“当今世界需要的是‘文明交流’和‘文明对话’，从中可以产生新的事物，从中可以生出友情，有友谊就有和平。”<sup>[6]</sup>在少年小说《太平洋的虹桥》和冒险小说《喜马拉雅山的光之国》中，儿童主人公的友谊映射了池田对东西和平对话的美好愿望，更体现了儿童在文明对话中创造性的主导力量。

#### 1. 《太平洋的虹桥》中的文化对话与共同体建构

《太平洋的虹桥》中，邻太平洋的三种文化形态交织对话：来自中国的转校生玉莲、20世纪初由美国赠送日本的友谊玩偶艾米丽在日本女孩光湖的链接之下产生了跨越文化障碍、团结集体的友谊力量。

在光湖的班级氛围从冰冷到温暖的过程中，文化对话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首先是核心人物光湖的改变，她一方面为美日双边交往的历史感动，另一方面受

<sup>[1]</sup> 尼古拉耶娃：《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刘存波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sup>[2]</sup> 同上。

<sup>[3]</sup> 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梁鸿飞、王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页。

<sup>[4]</sup> 池田大作、里哈诺夫：《孩子的世界》，卞立强、李力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9页。

<sup>[5]</sup> N·I Search & Study：第八章 精神の「内発性」——人類を照らす普遍の光，「21世紀への選択」マジッド・テヘラニアン（池田大作全集第108卷），しおり1。

<sup>[6]</sup> N·I Search & Study：関西代表者勤行会 1996.3.21，スピーチ（1995.5～）（池田大作全集第86卷），しおり3。

战时妖魔化异文化导致人心向善的冲击，感悟到接纳他者，以信任、友善对话异文明的重要性，这驱使光湖决意改变玉莲、健太的处境和关系；其次是玉莲被光湖手中的艾米丽娃娃所吸引，终于愿意与同学们分享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娃娃凤春，并借由凤春的故事打开了同学们倾听的窗口，以真诚的文化对话唤醒同学们的共情；再次，健太受到同学们与玉莲对话的感动，相信了他者的信任和善意，接受了光湖对他诚恳的求助，选择了帮助他人的“勇敢的道路”<sup>[1]</sup>；最后受到健太转变的影响，同学们都为玉莲伸出援手，将对话的结果——友爱和平结成的“万国旗”挂在空中，整个故事在对话的线索中延伸，形成了闭环。

在对话得来的友谊故事里，玉莲从一个流散的、被孤立的他者变成了共同体的一员，随着身份认同的改变，自然流露出了开朗热情的本性。与之相似的还有背负着沉重历史的玩偶艾米丽，她从散落在角落被人遗忘的处境中解脱，再次被接纳和喜爱。此外，健太因为克服了孤独与猜忌，从作恶的、引发冲突的“捣乱头子”变为勇敢友谊的使者，拥抱了班级这一共同体，可见对话对于儿童从“独体”到“共同体”<sup>[2]</sup>成员的身份变化起着关键作用。池田曾在“对话的重要性”中强调：“因为只有通过东西方的对话，才能期待构建‘全球性文明’”<sup>[3]</sup>，《太平洋的虹桥》饱含了他对东西对话、人类团结的期盼，其中“打破文化隔阂，发扬儿童无差别的共情能力的书写”<sup>[4]</sup>，更体现了“世界公民”教育的创作动机。

## 2. 《喜马拉雅山的光之国》中的文化冲击与重塑

《太平洋的虹桥》是池田基于真实历史的创作<sup>[5]</sup>，《喜马拉雅山的光之国》则是一部幻想色彩浓郁的冒险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儿童勇敢的面对文化冲击，并且通过对话的力量改变了邪恶的伦理环境，重塑了伦理秩序。

苏里亚对光之国歪曲伦理环境的改变来自于对异文化的质疑，他提出“戴使人低头的项圈，难道不奇怪吗？这不是虚伪的悲伤吗？”<sup>[6]</sup>这种质疑精神即是池田所说的“鲜活的批判力”<sup>[7]</sup>，是“探究真理”<sup>[8]</sup>“实现和谐”<sup>[9]</sup>的重要力量。在小说后记中，池田表明了创作的出发点：“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拥有永不言弃的坚强内心，第二，希望孩子们成为能够勇敢说出真相并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人。”<sup>[10]</sup>池田期待儿童能够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并且能够为自己的信念践行。他信任儿童，认为他们并不只是教训的接受者、被动者，而是“变革历史的主人公”<sup>[11]</sup>

[1] 池田大作：『太平洋にける虹橋』，金の星社，1987年，47頁。

[2]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外国文学》，2016，（02），第70-79頁。

[3] N・I Search & Study：対話の重要性について 「大いなる魂の詩」チングス・アイトマートフ（池田大作全集第15巻），しおり3。

[4] 李俄宪、吴江舒悦：《池田大作儿童文学中的伦理教诲价值研究》，《第11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462頁。

[5] 池田大作：『太平洋にける虹橋』，金の星社，1987年，139頁。

[6] 池田大作：『ヒマラヤの光の王国』，金の星社，1998年，45-46頁。

[7] N・I Search & Study：第20回「SGIの日」記念提言 1995.1.24，「平和提言」「記念講演」（池田大作全集第2巻），しおり22。

[8] 同上。

[9] 池田大作、松下幸之助：《人生问答》，卞立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9月，第162頁。

[10] 池田大作：『ヒマラヤの光の王国』，金の星社，1998年，109頁。

[11] 池田大作：《孩子们是“未来的宝贝”：教育箴言录》，卞立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08頁。

和无限成长着的人。拥有批判对话能力的儿童能够向不当的异文化规则发问，甚至有能力和打破错误的文化教条，这也是儿童直言不讳的天赋所致。

在池田看来，邂逅文化碰撞时，理解差异的对话和辩证批判的对话是缺一不可的“硬币的两面”。他所传递的观念是既要发挥“相结合的力量”<sup>[1]</sup>，“尊重理解差异并将其作为成长资源”<sup>[2]</sup>，又要保持对异文化不合理规训的警惕，为实现文化的扬弃<sup>[3]</sup>真诚地敞开并主动付诸行动，这正映射了池田对对话作用与目的的深刻理解。

## 四、敬畏：与自然的对话

池田对话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人类文明世界，他还将孕育万物的自然作为对话方，强调“本来，人类的生命就具有与‘宇宙’对话、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广阔性”<sup>[4]</sup>。以敬畏之心对话自然，是池田儿童文学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它与上文提到以和平友好为目的的文化对话同根并蒂，因为池田认为“环境教育是实际感受生命的尊贵，争取与自然共生。这与培育丰富的心灵、促进与他人和睦共处的教育本身完全一致”<sup>[5]</sup>，甚至指出与自然的对话、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是实现人类和平的先决条件<sup>[6]</sup>。在池田的儿童文学中，对话自然的主题主要体现在关爱动物、保护生态和万物共生三个面向。

### 1. 《雪国王子》中的动物他者关怀

《雪国王子》是一部中篇动物小说，讲述了少年吾一帮助雪国王子照顾南迁的天鹅的故事。动物小说是一种儿童文学体裁，其特点在于以动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形象地描绘动物的生活，包括寻食、求偶、避难、御敌的情态、技能，以及动物在大自然中的命运、遭遇、动物间的关系、动物与人类的接触等，以此表现大自然的生动，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雪国王子》以天鹅为刻画对象，不止步于千篇一律的知识介绍，不吝惜笔墨地展示了候鸟迁徙的路径——11月从西伯利亚和北美洲飞到日本的北海道和其他亚洲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等地，第二年3月春天跨越5千公里返回故乡……具体丰富的信息能够引导儿童“乘着天鹅的翅膀”，对国境以外地球的广袤无垠充满好奇。此外，通过吾一奶奶之口，述说了野生天鹅恶劣的生长环境与长成的不易，在一百只天鹅中，只有三十只能活过一岁，而只有十只能活过四岁，以激起儿童读者对生命脆弱性的“情动”，让儿童明白生命的珍贵。对天鹅夫妻生死不离的深情描写，是对儿童情感观念润物无声的教诲。天鹅故事引起了吾一“伦理的回应”，使他在与天鹅的朝夕相处中从胆小怕冷变得勇

---

<sup>[1]</sup> 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63页。

<sup>[2]</sup> 池田大作：《对“地球公民”教育的一个考察》，池田大作全集第101卷，圣教新闻社，第420页。

<sup>[3]</sup> 池田大作、松下幸之助：《人生问答》，卞立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9月，第162页。

<sup>[4]</sup> N·I Search & Study：民衆に愛された哲人 若き日の読書，「続・若き日の読書」（池田大作全集第23卷），しおり6。

<sup>[5]</sup> 池田大作：《孩子们是“未来的宝贝”：教育箴言录》，卞立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sup>[6]</sup> N·I Search & Study：環境破壊と依正不二の哲理，「大いなる魂の詩」チンギス・アイトマートフ（池田大作全集第15卷），しおり13。

敢强壮，一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承认动物具有与人类平等的感情主体地位。他曾在《动物故我在》中提出动物具有“伦理性的中断力量”（an ethical interruption）<sup>[1]</sup>，卡拉柯（Matthew Calarco）更是在批评列维纳斯时指出动物的“活力、兴奋和情感”都是赠予人类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礼物”<sup>[2]</sup>，池田也曾经批评基督教将灵魂视为人独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认可佛教“承认动物、草木、石头作为‘生命’存在”<sup>[3]</sup>的人间主义。承认动物的伦理地位，与动物平等的对话，是池田儿童文学的重要所指。

## 2. 《王子与珊瑚海》中的生态主义

池田深知“自然界是在动物和植物的微妙平衡的基础上形成的”<sup>[4]</sup>，因此认为“广义的自然环境的和谐”<sup>[5]</sup>不可忽视。《王子与珊瑚海》讲述了生态循环中人类的贪欲、报应与救赎。整个琉球王国中，只有阿亮心怀忧虑地倾听自然的声音，与生态对话。阿亮深知渺小如人类的生命，广袤如陆地与海洋都处在生态循环圈内，人、动植物、岛屿和海洋环境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万物的关系是有机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旦其中的一环失序，整个生态循环圈便会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环环崩塌。遗憾的是阿亮费尽全力也未能阻止人类滥伐带来的灾难，最终选择以生命作为许愿的筹码，换取琉球生态的重塑。

阿亮的牺牲也体现了人与生态的一体性：他的躯体化为星雨，降落在琉球的每一个角落，彻底的融入了生态循环每一环节。这一书写体现了池田“人与环境最终要融为一体”<sup>[6]</sup>的“依正不二”自然哲学观。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不在危机解除后戛然而止，而是描写了小尤捧起砂砾的情景，她通过海滩的细沙读取了阿亮伟大的意志，这一情节传递了万物有灵的思想：人类之外的生命并不是冰冷的、无关紧要的机械，能够对话的灵魂包孕其中。

此外，池田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琉球族群的关心。“万世一系”“单一民族”作为日本国家主义的残余，深刻的影响着日本人的国族身份认知，而冲绳又往往处于被边缘化和被歧视的地位。小说不仅还原了历史上琉球人与生态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也毫不避讳的揭露了权利阶层“日本武士”的暴行，他们对琉球平民的压榨，对琉球国家政权的威胁，对琉球资源的掠夺是导致生态失调的根本原因。池田对权力阶层日本武士的批判再次从侧面体现了其和平共生同质的观念。

## 3. 《沙漠王国的公主》中的共生互助

与《雪国王子》不同，《沙漠王国的公主》虽然也将动物作为主角，却并非动物小说，而是一篇将动物人格化的拟人体童话。二者的区别是前者“写实”，

<sup>[1]</sup> 赵波：《动物伦理基础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9页。

<sup>[2]</sup> 马修·卡拉柯：《动物志：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动物问题》，庞红蕊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69页。

<sup>[3]</sup> N·I Search & Study：環境破壊と依正不二の哲理，「大いなる魂の詩」チンギス・アイトマートフ（池田大作全集第15卷），しおり16。

<sup>[4]</sup> 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6月，第65页。

<sup>[5]</sup> 池田大作、顾明远：《和平之桥：畅谈人间教育》，高益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2页。

<sup>[6]</sup> 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



注重动物知识的客观介绍，后者通过变形产生，注重故事的审美教化作用，这一体裁可以追溯至《伊索寓言》等早期文学形式。《沙漠王国的公主》中将动物和公主共同作为重建家园的主体，定位了“共生互助”的人类-动物关系。

在池田看来，“所谓‘共生伦理’，其基调是强调和谐而不是对立，强调统一而不是分裂，强调‘我们’而不是‘我’，他是一种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共生互助、共同繁荣的心里倾向”<sup>[1]</sup>。作品中的“共生互助”表现在改造环境时人类对动物极强的依赖，每个动物发挥所长，缺一不可，正反映了动物们特殊的习性与自然相融，促进生态秩序正常运作的法则。然而面对破坏绿洲的人类，动物们本没有义务协作，特别是作品中的猴子、鹦鹉以及脱离族群的狮子，他们本是相对脆弱的生命体，为了保全自己他们一度逃避，促使他们改变的是公主的对话姿态。在他们的回忆中，公主始终将他们放置在平等的地位，对他们不利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因此在危机的关键时刻，他们愿意为了“对话的友情”与人类并肩作战，最终完成了重建家园的共同目的。

关爱动物、保护生态、万物共生是池田自然儿童文学中所传递的重要精神内涵，“对话”是三者的共同核心。池田认为“与自然交谈可以看清楚真正的自我、人和生命，自然是一面镜子”<sup>[2]</sup>，与自然生命的对话能够使人类摆脱暴力带来的优越感，只有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人类才能够在自然的镜子中照见纯粹的真我，并以敬畏之心维持可持续的共存。

## 五、尊重：与历史的对话

在《世纪的馈赠》中池田提出，历史学是跨时空的“对话”<sup>[3]</sup>，在其儿童文学中，对话历史的命题也频繁出现，其中既有美好的历史重现，也直面残酷的战争创伤，上文提到的《太平洋的虹桥》客观地描写了二战期间面对异文化时日本心理的扭曲，提及了日本对中国发起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池田曾在SGI会议上肯定了欧洲各国在二战后共同修订历史教材的行为，并提出亚洲各国也应该面对同样的挑战，他认为“真挚地审视过去，就等于真挚地面对未来。我相信，以‘对话’为中心，努力构筑共同的历史认识基础，对于展望亚洲和平来说是不可或缺的”<sup>[4]</sup>。这一对话历史的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体现在正视历史真相、反思战争、面向未来、珍惜文化遗产等多重维度上。

### 1. 《蓝海与少年》中的战争反思

相较于日本曾经侵犯过的大国，新几内亚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并不广为人知。在提及新几内亚战役时，往往与日军的惨败、美军的“蛙跳战术”等开战双方的历史相勾连，而沦为战争牺牲者的新几内亚民众的处境却少有提及。《蓝海与少年》便是反思新几内亚战役罪行的一部作品。

作为一部面向幼儿的绘本，作品中并没写明故事的国家背景，但是根据主人

---

<sup>[1]</sup> 池田大作、顾明远：《和平之桥：畅谈人间教育》，高益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9页。

<sup>[2]</sup> 池田大作：《青春对话：与二十一世纪主人翁倾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244页。

<sup>[3]</sup> 池田大作、章开沅：《世纪的馈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sup>[4]</sup> N·I Search & Study：第27回「SGIの日」記念提言 2002.1.26，平和提言・教育提言・環境提言・講演（池田大作全集第101卷），しおり78。

公阿德尔的人种、南部海岛的环境、海上贸易的历史、日美交战、以及南岛人同祖说可以推测地点应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在绘本中，依旧浮于海面的巨大军舰残骸、深受创伤的战时遗孀——阿德尔的奶奶，都在提示着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在阿德尔凝视沉船并质问宏时，历史责任也在凝视着宏，正像阿德尔所说“你们日本人在战争时对这个岛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奶奶已经告诉我了”<sup>[1]</sup>。池田曾在《青春对话》中斥责关于将战争反思视为“自虐主义”的言论，并直接指出“日本对中国做了什么，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事实’，就无法看清日本这个国家的‘现实’”<sup>[2]</sup>，正视战争是池田对待战争责任的根本态度，也正如作品中船长所说，人类的祖先正是乘着危险的海流才得以到达世界各地<sup>[3]</sup>，只有直面困难，与历史对话，与曾经的受难者对话，直面责任承认错误，宏、亚纪子与阿德尔才能恢复亲如手足的友谊，国与国才能拥抱没有嫌隙的真正和平。

对话历史，反思战争的最终课题是面对未来。船长相信以对话搭建友谊的儿童们有能力创造一个没有战争，和平、和谐、共同生活的新世界。儿童如何面对未来，决定了世界发展的走向，这也是另一部战争儿童文学《少年与樱花树》的主题，作品中爷爷对太一说：我们不能失去希望，要坚强起来，创造没有战争，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的世界是你们这一代的责任。两部作品均体现了池田对儿童的激励和厚望，尤其强调以和平为前进的方向，正如池田所说，“教育的目的始终是‘人的幸福’，是‘世界和平’”<sup>[4]</sup>，池田的儿童文学饱含着和平教育的价值。

## 2. 《沙漠中的宝城》与文化遗产保护

池田曾在与土井健司的对谈中盛赞吉川英治“与历史对话”的文学作品“永不褪色”<sup>[5]</sup>，池田也创作了不少以历史事实为原型的儿童文学作品，包括上文提到的《少年与蓝海》《少年与樱花树》《太平洋的虹桥》《王子与珊瑚海》等，其中《沙漠中的宝城》较为特别，它以常书鸿保护敦煌壁画的事迹为灵感，结合了冒险、穿越、奇幻的文学元素，表达了与历史文化对话，珍惜人类文化遗产的主旨。

作品中，与文化瑰宝的对话不仅提高了勇太的认知，更感染了他的情感，磨砺了他的意志。池田十分重视“知情意”<sup>[6]</sup>的教育，勇太在与周老伯和友兰的对话中“以心传心”，感受到了“心意”<sup>[7]</sup>对于人类创造历史、延续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心意”超越物质的可贵之处，于是摆脱了固执的“独体”价值观，回归现实世界真诚对话——一向好友致歉，并表达了对好友心意的共鸣。池田在后记做了题解，他指出《沙漠中的宝城》的“宝”，不仅是敦煌壁画这一文化瑰宝，更是其中所蕴含的“真心之宝”<sup>[8]</sup>。《沙漠中的宝城》为追念敦煌守护者常书鸿先生

<sup>[1]</sup> 池田大作：『青い海と少年』，聖教新聞社，2021年，22頁。

<sup>[2]</sup> N・I Search & Study：お隣・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青春対話」（池田大作全集第64巻），しおり2。

<sup>[3]</sup> 池田大作：『青い海と少年』，聖教新聞社，2021年，30頁。

<sup>[4]</sup> 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122页。

<sup>[5]</sup> N・I Search & Study：第四章 歴史との対話 「吉川英治 人と世界」土井健司（池田大作全集第16巻），しおり3。

<sup>[6]</sup> 池田大作、杜维明：《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卞立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23页。

<sup>[7]</sup> 池田大作：『さばくの宝の城』，学習研究社，1996年，46頁。

<sup>[8]</sup> 池田大作：『さばくの宝の城』，学習研究社，1996年，87頁。

所作，把握并传达了敦煌壁画与守护者故事中所凝结的关键内核。

池田曾赞叹德国对本国中世纪建筑的保护，而对日本文化遗产的消失表示遗憾，他重视文化遗产引起人“情不自禁地对历史和文化产生尊敬之心”<sup>[1]</sup>的作用，可见其对历史与凝聚历史的文化遗产所抱的崇敬之意。怀有尊重之心，是对话战争历史与文化遗产的先决条件，只有认清残酷的史实、尊重人类的文化成果，人性的美好才会代际相传，以此面向未来，和平与希望才会降临。

## 结语

池田大作的儿童文学有着多元对话的鲜明特质，对话既是书写策略更是内容本身。池田大作儿童文学多元对话的价值在于，通过自我对话的成长小说，儿童能够获得主体性构建的能力，培养美德，为与广阔的世界对话奠定健全的人格基础；与异文化对话的少年小说和冒险小说帮助儿童在进一步向他者敞开的过程理解世界的丰富性，在跨越文明的境遇里寻找融入共同体的契机，以信任和共情建立友谊，同时带着鲜活的批判力审视文化糟粕，以辩证扬弃的精神驱动选择和行动；通过与自然对话的动物小说、生态文学、拟人童话，引导儿童珍惜生命、敬畏生态法则，树立与自然共生的意识；通过跨时空的历史对话，传递尊重、正视人类历史的思想，直面史实的战争书写引导儿童形成正确的历史观，生成对和平的向往以及面向未来的信心与责任感。

池田大作对话观深刻作用于儿童文学创作，以自我成长的对话、跨文化的交流对话、跨物种的自然对话、跨时空的历史对话为内容，传递着培育美德、理解异质文明、敬畏自然生态、尊重历史事实的教诲价值。对话的多维向度指向了和谐共生的核心要义，体现了其世界市民教育的终极目标。理解池田大作儿童文学的多元对话特质与价值，是纵向认识池田大作文学世界的密钥，同时，在儿童文学“无意义”“无价值”论当道的语境中，池田大作的作品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善本。

---

<sup>[1]</sup> N·I Search & Study: 4 文化遺産の保存, 「21世紀への人間と哲学」デルボラフ(池田大作全集第13巻), しおり1。